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

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论

张 越

[关键词] 杨翼骧;中国史学史;《学忍堂文集》

[摘 要] 即使是在史学史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的 20 世纪 50 年代,杨翼骧先生仍在默默地坚持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纂工作。以系统的资料编年为基础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成为杨翼骧先生治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特点。杨先生条分缕析、归纳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史学史研究有着规范性、严谨性和示范性的意义。杨先生很早就致力于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他对中国史学史从古代到近现代发展的整体看法、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理论的思考等,都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杨翼骧先生是南开大学著名的史学史专家。1956 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杨先生的《秦汉史纲要》;1987 年、1994 年和 1999 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杨先生编纂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第二册和第三册;1983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杨先生与吴泽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2002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杨先生的学术文集——《学忍堂文集》,收录了杨先生的主要研究论文和其他研究成果;杨先生去世后,由姜胜利先生整理的《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于 2006 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2013 年适逢杨先生逝世 10 周年,9 月,杨先生生前撰写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以《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为书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10 月,经由乔治忠先生和朱洪斌先生订补,《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成四卷本,更名《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出版(商务印书馆)。通过杨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一窥杨先生的治学过程与学术成就,而杨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贡献也得以较为清晰地反映出来。

《学忍堂文集》除“自序”和“附录”外,共收录了 25 篇文章,大体按照论文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除《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曹操打乌桓是反侵略吗》等少数几篇外,大多数都是关于史学史的文章。在这些史学史文章中,从内容上看,大致有下面几类:一类是论及司马迁、班固、裴松之、范晔、刘知幾、司马光等史家的史学;一类是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如《先秦史学编年》、《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南北朝史学编年》、《五代十国史学编年》等;一类是某个时代的史学史,如《三国时代的史学》、《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说中国近代的史学》等;一类是史学专论,如《漫谈历史的研究》、《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中国史学史绪论》、《谈治学与做人》等。这几类文章说明,杨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是一位“全面型”的学者:于史学史的基础性研究,杨先生有对史家史书的专门阐述和史学史编年的编纂;于断代史学史研究,杨先生有先秦、三国、近代史学的专文;于史学史的理論性研究,杨先生有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等方面的论述;如果再联系到《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和《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则杨先生在中国史学史通史方面也有成就。

一 以史学史资料编年为基础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从《学忍堂文集》全书来看,首先可以明确的是,编纂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是一直贯穿于杨先生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文集》中收有《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发表于《南开学报》1957 年第 4 期)、《南北朝史学编年》(发表于《南开学报》1964 年第 5 卷第 1 期)等 4 篇断代史学史资料编年,从《文集》的编排顺序上看,这些成果都应该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的。杨先生一直坚持致力于编纂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可见他对史学史学科基本建设的不懈与执著,因为这是他早年就立下的志向。1936 年杨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上了赵万里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和姚从吾的历史研究法课程,始对史学

史感兴趣。1939年年初去昆明西南联大复学途中,在南宁崇善县当一名抄写员赚取路费和生活费,在这个县的图书馆,他系统阅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补编》,看到“姚名达在书的夹注中说决定写史学史启发了我,既然中国史学史还没人写,就立志学习中国史学史了”^①。他还阅读了《文史通义》、《史通》,选读了“前四史”、《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并陆续写出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更加坚定了学习史学史的意志”^②。1940年来到西南联大后,时值姚从吾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杨先生得以较为系统地学习中国史学史。在此期间,他受到同学的影响,“设计要编辑‘全史学史文’……编辑《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想法,实际是原‘全史学史文’想法的修订”^③。他用了大部分时间研读史学史方面的书籍,并写出了《晋代的史学》一文,在姚从吾的指点下,下功夫对文中的《晋代史官表》做了修改和补充,该文虽然遗失在返回北平的路上^④,但是《晋代史官表》的撰写,应该是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最早的相关成果了。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中的相关部分从上世纪50年代陆续发表以来,至今终成四册全部出版,大约历时六七十年,个中艰辛只有杨先生本人及南开大学参加编纂的史学史研究团队最为清楚。笔者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杨先生先期完成的三国两晋时期的史学史资料编年等成果是在上世纪50年代,而在那个时代,中国史学史研究基本无人问津,极少有研究成果发表。“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低潮。除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1957年)以外,几乎没有新的著作问世。”^⑤杨先生于1949年9月在北大开设“中国史学史”课,1955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文选”和“中国史学史”课,1958年在天津师范学院讲授“中国史学史”课^⑥,他说:“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开此课的很少,清华、复旦、北师大没开……这门课没人注意,我没有名气,别人不知我教此课,我也不知道别的学校有人教,所以很孤独,没有同道交流经验。”^⑦孤独的杨先生在少有同道交流的情况下,几乎是独自讲授着中国史学史课程,坚持不懈地进行着中国史学史资料的搜集、编纂和研究工作,并且在《南开学报》上发表了《三国两晋史学编年》,“这是一篇很有学术分量的长文,是解放后内地最早的中国史学史论文之一”^⑧。笔者认为,无论是在教学方面还是在研究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头十年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正是由于杨先生等人的努力才没有成为空白。

1961年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确定史学史作为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同时筹备编写中外史学史教材。缘此契机,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先后召开座谈会,就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对象、任务、分期、研究目的、教材撰写原则和方法等作了较为广泛的讨论^⑨。从《学忍堂文集》中可以看出,杨先生在此期间并未轻易发表史学史学科理论方面的见解,而是更为扎实地从事着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具体研究工作,连续发表了几篇重要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同时仍然继续着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纂工作。1987年以后,《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陆续出版,在杨先生生前已经出版了前三卷。笔者认为,编纂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伴随着杨先生治中国史学史之终始,而从扎实的资料出发并以系统的资料编年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史学史,成为杨先生及南开大学史

①⑦ 杨翼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发展及我的学习经历》,见《杨翼骥中国史学史讲义·附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5页。

②④ 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骥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③ 杨翼骥:《谈治学与做人》,《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7页。

⑤ 瞿林东:《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

⑥ 杨翼骥:《学忍堂文集·附录:杨翼骥先生学术编年》,第464~465页。

⑧ 乔治忠、姜胜利:《杨翼骥教授的史学成就及其学术特点》,《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⑨ 在北京有陈垣、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康、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等人参加了相关讨论会,见《中国史学史资料》1961年第4期载郭彭文《关于中国史学史(古代部分)的讨论》;在上海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人参加了相关讨论会,见1961年11月28日《文汇报》载《上海史学会讨论史学史的对象、任务和编写原则》。此外,还有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载郭彭文《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载《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等相关报道。

学史研究的主要特色之一。

单就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这部著述而言,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意义已经有多位学者加以阐述^①,在此,笔者仍愿引述自己几年前写的一段评述:“这是以传统史学中长编的方式编纂的史学史资料长编,作者倾几十年的精力搜集、抄录、爬梳史料,凡涉及中国史学上的人物、著作、事件、制度诸项皆以时间先后依次编订,编者时对相关问题的考证,疑者存疑。如此‘记注’之作,在笔者看来,其学术价值及学术生命力远高于某些所谓‘撰述’之作。此种体裁的史学通史,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实实在在的。”^②

二 条分缕析、归纳综合的研究方法

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史学史学科受到普遍重视。《学忍堂文集》所收的《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知幾与〈史通〉》等几篇重要论文,都是在这个时期公开发表的,是杨先生在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之外的标志性研究成果。这些论文的问世,奠定了杨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发表于1961年12月6日《天津日报·学术专刊》上的《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文章的“标题仍然运用‘奴隶社会’的概念表示时间断限,但全文内容并不讨论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的问题”^③,实际上论述的就是先秦时期的史学史。文章分三个部分,“史学的起源”是论文字的出现和史官的设置,“奴隶社会的史书”主要介绍《尚书》、《周书》和《春秋》等先秦史籍,最后是总结“奴隶社会的史学成就”,以简洁精练的文字将先秦时期史学的基本情况作了叙述,除了言明已经出现了记言、记事及按时间先后记载的编年体等不同形式的史书,更强调先秦时期史学“认识到历史记载对于了解过去、鉴往知来及垂训鉴戒的作用,因而树立了尊重历史记载的观念”,这样的认识在当时而言是颇有见地的。该文可能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首篇阐述一个时代史学史发展的专文^④。

《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发表于《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作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论文概括了裴注的内容,凡八类:关于文字上的解释,即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的注文;补充记载简略处;补充记载遗漏处;考辨记载的讹误;对于各家不同的记载的意见;对于史事及人物的评论;对于陈寿的批评;对于其他史家的批评等。作者总结了裴注的史学价值,认为裴注使陈寿书在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边疆各族及外国等方面的记载更为完备,弥补了《三国志》过于简略之不足,反映了当时其他史学成果的情况和史学发展的水准,指出了裴注在补充事迹时出现的繁杂、遗漏等不足。杨先生说:“裴《注》的成绩是巨大的,虽然也有缺点,但不能因而抹煞其价值,它的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广辑资料,提供了大量的具体事实,使后人获得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在进行三国时代历史的研究时得到很大的便利。”值得称道的还有,论文总结了裴注在史学史上的四点贡献:开创了史注新法,提出了审查史料的意见,发展了历史考证学,开展了史学批评。其中“史注新法”和“史学批评”均成为后来继续进行的研究课题,前者是因裴注而展开的对魏晋时期经学、史学关系的深入研究^⑤,后者则日益成为一门受到重视的研究领域;审查史料与历史考证学大体相近,杨先生总结的“碑铭及家传不可轻信”、“作者妄加修饰之言不符事实”、“自相歧义的记载必有讹误”、“孤

① 如蓝天海:《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陆申:《推荐一本嘉惠后学的史学专著——评杨翼骥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历史教学》1988年第1期;陆申:《读〈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二册》,《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等。

② 张越:《论史学史研究中的中国史学通史撰述——兼评杜维运教授著〈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页。

③ 乔治忠:《史学史专家杨翼骥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学术贡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④ 据笔者所知,同类文章仅有白寿彝先生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的《中国史学的童年》一文。

⑤ 参见逯耀东:《裴松之与〈三国志注〉研究》,《编译馆馆刊》第3卷第1期,1974年3月;胡宝国:《〈三国志〉裴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2001年。

立的记载不足置信”、“敌国传闻之言不可轻信”^①等意见,也是审查史料和历史考证的不刊之论。

《刘知幾与〈史通〉》发表于《历史教学》1963年第7、第8期,对刘知幾及其《史通》作了全面介绍、分析和总结。《史通》内容丰富,各篇与各种观点相互牵涉关联,杨先生在文中对《史通》以主要观点分篇归类,分十二方面介绍其内容,包括分析介绍历代史书情况、论史官、论史书体裁体例、论搜集与整理史料、论叙述方法与技巧、论记载和品评人物、论史家著史态度、论史注、论史评、论史著高下优劣、论删削和刘知幾自述,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史通》的特点是评论有据、兼指得失、批评尖锐和主张明确,总结了刘知幾对于史学的贡献:第一次为中国史学作了比较全面而详细的总结;提倡“直书”、“实录”,揭发并斥责了历史的歪曲者和捏造者;批评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对历史编纂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指出了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条件。

乔治忠、姜胜利认为《裴松之与〈三国志注〉》一文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是:“整篇文章的结构是大小层次的条分缕析,论述中有分析、有归纳也有综合,得出条理分明、轮廓明朗的统括性认识。”“形成一种全面研究、归类叙述的架构。”^②笔者对此深表赞同,这样的研究特点在杨先生的史学史研究中均有体现。《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和《刘知幾与〈史通〉》的文章结构都是先介绍裴松之、刘知幾的生平著述,然后阐述《三国志注》、《史通》的主要内容,接着分析《三国志注》的价值、《史通》撰著特点,最后是总结裴松之、刘知幾对史学的贡献,论文结构清晰分明。行文中的条分缕析做得更为突出,无论是他总结出的《三国志注》的八项内容、裴松之的四方面贡献,还是他归纳出的《史通》的十二项内容、四项撰著特点和刘知幾的五方面贡献,均体现出了“条理分明、轮廓明朗的统括性认识”和“全面研究、归类叙述的架构”。这样的研究套路,不仅对研究对象的分析更为透彻、深入,而且具有对史学史研究论文撰写的规范性、严谨性和示范性的典型意义。

对于那些结论性的意见,杨先生照例都要认真分析前人的已有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陈述己见。如论及《三国志注》的价值,杨先生先叙述了刘知幾、陈振孙、胡应麟、侯康、四库馆臣、杨文荪等的相关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肯定裴松之在历史考证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先介绍了譙周《古史考》及司马彪对《古史考》的考辨,又提及孙盛的《异同杂语》等书;总结刘知幾的学术贡献,先介绍了黄叔琳《史通训诂补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刘咸炘《史学述林》、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中对刘知幾的一些评价,由此引出作者自己的研究结论^③,充分体现了杨先生“客观求实、审慎平允的治史风格”^④。

三 撰著从古代到近现代的中国史学史的志愿与实践

杨先生曾经说:“1939年复学以前,就有雄心写中国史学史,当时此书没人写……正因为有了这个雄心才使我不断地学习史学史,一读史学史著作就有兴趣,成为一种爱好。”^⑤说明撰著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杨先生从开始致力于史学史研究之时就已经立下的宏愿。杨先生说:“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这年暑假后,我开始在北大史学系教中国史学史课,讲授内容从上古一直到解放前,分古代和近现代两大部分。古代分八章,每章之后介绍同时期西方史学的情况,并作比较;近现代分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二章,前者从梁启超开始,后者从李大钊开始,都讲到解放前。备课时用十六开白报纸写出详细提纲,其中主要是基本材料。边学边教,边教边学,教学相长,收获不小,一年下来积累了六厚册讲稿。”^⑥乔治忠先生认为,这是杨先生“计划撰写《中国史学史》的一个基本思路”^⑦。由于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工作量太大,加之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三四年间又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致使杨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撰著计划被延误,但是杨先生仍然表示:“待《资料编年》工作完成之后,如果身体条件许可,我仍想写一本中国史学史专著,以

① 杨翼骥:《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学忍堂文集》,第193~194页。

②④ 乔治忠、姜胜利:《杨翼骥教授的史学成就及其学术特点》,《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分别见杨翼骥:《学忍堂文集》,第186、194~195、221页。

⑤ 杨翼骥:《漫谈治学与做人》,见《杨翼骥中国史学史讲义·附录》,第193页。

⑥ 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骥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⑦ 乔治忠:《史学史专家杨翼骥先生的治学历程和学术贡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了夙愿。”^①据乔先生回忆,2002年杨先生曾交给他一部“多年积累的中国史学史书稿”,“根据纸张和杨先生的学术经历判断,除少数内容撰写于20世纪60年代,大多内容撰写于1983年到1986年间”^②。姜胜利先生根据1981年和1983年两次听杨先生中国史学史课程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也可使我们了解杨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的大致轮廓和基本内容,而新近出版的《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一书,则使我们看到了杨先生的这部中国史学史讲义的全貌。

杨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纂的中国史学史资料和发表的史学史研究论文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学忍堂文集》中收入的《中国史学史绪论》和《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二文,毋宁说就是杨先生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的绪论和先秦时期史学的部分内容。然而,从他最初进行中国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时候,他的研究视野就涵盖了中国近代史学,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杨先生断续进行着中国古代史学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贯通地研究中国史学发展史是杨先生自始至终的目标。《文集》中收入的《说中国近代史学》一文,则反映了杨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学方面的系统思考。《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虽为杨先生的学生据课堂讲义整理而成,《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虽属手稿而未经杨先生本人最终修订完善成书,但从二书中也大致可以看出杨先生对史学史基本问题的见解、对中国史学史分期的观点、对不同阶段中国史学发展特点的归纳和概括、对从前秦时期到1949年前的中国史学史基本面貌的梳理。

还是在1949年杨先生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始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时候,其教学内容的规划中,就已经包含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内容,就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而言,杨先生涉足近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和思考可能是最早的。在1949年时,他的教学计划是将近代史学的两大宗——“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都讲到解放前”;而到了80年代初,杨先生在教学中将近代史学的下限甚至已经延续到了“文革”前。从《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可以看到,最后一部分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普遍发展”^③;而《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的最后一部分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普遍发展(解放后至‘文革’前)”,包括“中国史学会的成立”、“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和“对历史重大问题的讨论”^④。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先生总是能主动地、自觉地将最近的史学发展纳入史学史的研究视野中,充分表现出了一位史学史专业学者对史学动态发展的敏感意识、前沿意识和学术责任感。今天来看,杨先生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一些观点对我们依然有着很大的启发。譬如他强调判断传统史学和近代新史学的标准,“一是应当形成比较系统的新史学理论,二是出现按新观念、新体系编纂的比较流行的历史著作”,据此,他认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正式建立,是在1901~1906年间”^⑤。又如,他重点提及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世界史的研究与著作”,列出陈衡哲的《西洋史》和何炳松的《外国史》两书。另如对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论战各方的介绍和评价等。

重视学科理论、史学理论中相关概念的界定与厘清,是杨先生在思考撰写中国史学史时的又一个特点。有关中国史学史中涉及观点、理论或思想的内容,杨先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提法,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1998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绪论》,可视为杨先生对该问题的一次集中表述。文中,他将中国史学史的内容分为历史观、历史编纂学、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官制度、史家的生平及其成就等六个方面^⑥。杨先生非常清楚地阐明: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⑦,即我们今天所谓“历史理论”;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分别是“对史学的看法”和“对史学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作出有系统的理论性的阐述”^⑧,即我们今天所谓“史学理论”。在这里,他将“史学思想”与“史学理论”

① 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乔治忠:《史学史专家杨翼骧先生的治学历程和学术贡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③ 见《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

④ 见《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第179~182页。这里的“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部分,杨先生写明“许多从政治上看是错误的”。

⑤ 杨翼骧:《说中国近代史学》,《学忍堂文集》,第422页。同样的观点还见于《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第126~127页。

⑥ 《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中的“序论”部分,将中国史学史的内容分为历史编纂学、历史观、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史学评论和史官制度等六个方面,与《中国史学史绪论》的相关部分内容相近。

⑦⑧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410、413页。

区分开来,指出“史学思想”是包括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对史学的某一方面问题的阐述,显得零碎杂乱和不成系统,“史学理论”则是对史学的系统的理论性阐述,如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笔者认为,这样的区分,使我们今日所谓“史学理论”概念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事实上,很多人都可以对史学发表这样那样的议论和见解,却很少有人对史学中的种种问题作通盘的、细致的、深入的探讨,若把二者不加区别地统称在一起,则难免削弱对相关思想、理论的价值判别,以致在概念上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杨先生作出这样的区别是值得重视的。

杨先生的史学史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譬如,他很早就提出了要加强史学评论的研究,强调史学批评的重要。早年撰写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一文中,杨先生就指出“史学批评是促进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①,在《刘知幾与〈史通〉》一文中总结“批评尖锐”是《史通》的特点之一^②。《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和《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的“绪(序)论”部分都将“史学评论”列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在《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有杨翼骧先生撰写的“史评”一条:“史书分类名目之一。始于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及张之洞《书目答问》亦有之。其内容可分两种:一为评论史书者,如刘知幾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一为评论史事者,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等。”简明清晰地把史学评论分评论史书和评论史事两类。史学评论与史学批评在今天已经成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我们不能不对杨先生的学术眼光表示钦佩。

再如,杨先生很早就提倡中外史学比较研究。还是在1949年讲授中国史学史的时候,杨先生说那时他将中国史学史的“古代分八章,每章之后介绍同时期西方史学的情况,并作比较”^③,说明他从一开始系统讲授中国史学史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中西史学比较这一在当时几乎无人问津的课题。读《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其中涉及中外史学比较的内容,出现在“司马迁的史学”中,讲到公元前2700年前后埃及就有了编年史、古希腊史学及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出现的《荷马史诗》,将希罗多德的《历史》和罗马史家的《罗马通史》与《史记》相比较,还提及《史记》在日本的流传、日本学者研究注释《史记》的情况以及《史记》在苏联等国的传播。

杨先生一直默默地坚守于史学史研究领域,执著于史学史研究事业,以其笃实、勤奋的学风和治学态度,为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史学史的基础研究、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收稿日期 2013—06—12

作者张越,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A Narrative of Mr. Yang yixiang's Research on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Zhang Yue

Keywords: Yang Yixiang;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ollected works of Xueren tang

Abstract: Mr. Yang Yixiang had been persisting in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 studying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based on systematic material arrangement by year became his main study feature. His analyzing and generating method of study in normalization, preciseness and demonstration is significant to later researches on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or a long time Mr. Yang was devoted to produce a comprehensive work on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is idea i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discipline and its practices.

【责任编辑 殷 铭】

①②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195、217页。

③ 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